



# 走向启蒙的艰难路程

根据演讲稿“学术界与企业化社会” (THE ACADEMY AND THE CORPORATE PUBLIC) 改写  
—共分两部分—

## 第一部分 学术界 研究部门, 文化界和自发组织

“学术界与企业化社会”是我正在研究的课题的一部分, 在这个部分, 我想探讨在经济全球化所导致的巨变中, 学术界 (作为唯美艺术的一个漫无边际的领域) 和公共领域之间的关系。

我相信, 这个巨变与艺术功能的变化同步, 与其同步的还有艺术家社会作用的变化和教育与研究质量的变化。

那么, 在这些发展中, 研究机构、自发组织和文化界都发挥了什么作用呢?

## 德国的情况:

2009年秋季爆发了大规模的大学生占领校园行动和抗议活动,这个活动起始于维也纳的艺术院校,并发展到欧洲其他国家甚至美国。

学生的占领活动是由教育商业化,并将这种做法机制化的波伦亚进程所引起的,这个进程是一个在所有层次都完全失败的努力。

首先,学士/硕士制和学分制的实施中断了德国一直引以为自豪的洪堡传统方式。这个传统把“教育”当作一个神圣的工程,意在使学生能够进行一种自我塑造的自发过程。

然而,这个教育理念现在已经屈从于技术化的训练,学生们意识到,纯粹是商业因素决定大学的结构和教学。因此,贝托斯曼,这个属于最有实力的新闻企业中的一个,是波伦亚进程的发起者,这并不奇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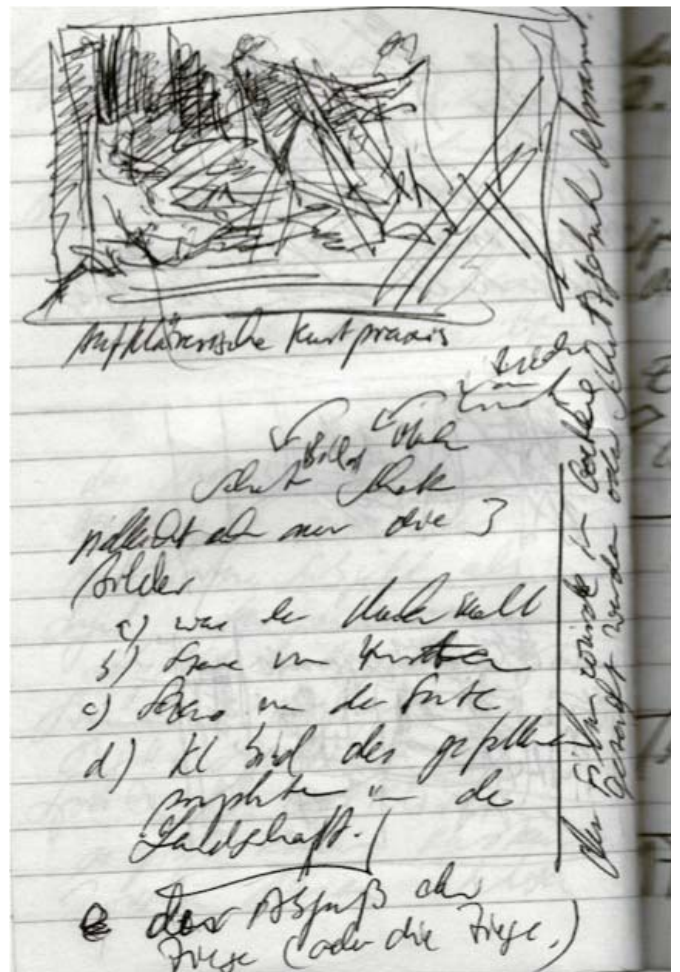
第二,引入了缴纳学费的作法。以前,学生可以免费读大学,现在需要每学期缴纳450欧元。这很可能会使大学转变为盈利机构。我觉得这是教育私有化的第一步。

第三,机构内决策的民主形式,高等教育的自治已经被合营的商业结构所取代,它使外部人员,即刚刚设立的监督委员会(大学理事会)对大学可以施加不合理的影响。比如,那些大型企业如西门子、宝马和罗兰·

伯杰公司(包括他本人!)都被任命为慕尼黑大学董事会的成员。

新自由主义政治对艺术、教育机构和整个社会极具破坏性的影响,这已经越来越明显。在全球金融危机中,人们似乎感受到,企业对所有公共领域的渗入,比如说对大学,已经过于深入。

我们的教育机构已经遭到毁坏,到处是失败的项目:男性主宰、新自由主义和公民社会。本研究可以被看作是对废墟之下可以出现什么作的一个探讨。



## 研究遇到的问题和机遇

那么，怎么进行研究，从那儿开始呢？我认为，我们必须十分小心，避免助长和促进当代关于研究的炒作，从而完全杜绝这个已经膨胀了的词汇。

### 关于研究的一些问题

- 研究已经成为进行艺术项目的唯一正当的理由。
- 如今每一个项目都必须包装成“研究”才有可能获得资助。
- 研究资助的申请需要用一种特殊的语言，这已经从一开始就使研究项目受到了污染。
- 研究已经成为研究生学习计划中一个必备的内容。
- 学生和老师都必须从事研究。
- 上述研究都要得到评估。
- 因此必须为学生和研究机构项目成功与否设立评估标准。但是我们如何来判断一个项目是否成功呢？通过学分制？通过考试和外部评估？
- 人们因此对研究项目进行评定和判分，对大学进行评估、排行，使它们相互竞争。为此需要设立外部公司和评定机构。



- 外部的评估很容易演变成监督和控制项目。
- 因此，得到它们所给的“很好”，意味着得到了精减和控制。
- 施加压力始于决定是否对某个项目进行资助的时刻，也就是说，如果占主导地位的思想方式认为某个项目有问题或不想接受这个项目，这个项目便没有可能获得资助。这可以被称作先发制人式的审查。

- 一般来说只有可能带来利润的项目可以获得批准，所以申请已经预示着利润。
- 对实现利润的判断与研究应有一个开放式进程的原则相违背。
- 最糟糕的是，所有这些措施对研究人员来说都索然无味。
- 它们使人们不能享受教学和学习，也不利于极为有趣的教学实验。
- 在这样环境中进行研究只能是令人消沉，“科学研究的欢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 研究所具有的机遇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研究也有一些机遇。

- 研究是不透明的、神秘的，也就是说危险的，就像到未知地的旅行。
- 研究是一个结果开放式的进程，最终结果既不可预见，也不能保证。研究的战略和方法取决于先前的经验，或有时是即兴的，时时发生着变化，就是说，不是像许多赞助人所希望控制的那样。

比如，计算机控制研究者汉斯·冯·福斯特为他已经开始进行研究的一个项目申请资助，这个项目他已经取得了成果，而他的最后的解决办法是使用其他项目的资金。

这对于进入一个未知的领域是一个勇敢的行为。

- 在我看来，研究工作必须克服其自身的有限性。
- 但必须寻求对研究结果的外部限制同样作出反应（环境的变化、盲区的出现和控制机制），以便尽可能地消除这些限制。
- 研究也因此可以利用不寻常的抵制办法：罢工、阻碍活动和抗议不仅是可能的，而且可以将它们看作是可以从内部获取新情况的实验。

### 唯美艺术研究的必要性

在唯美艺术领域，我们到处都看到一种什么都行的态度，一种使一切都同样有效，同时又同样单调的任意性，一切似乎都可以，只要能带来人们需要的新产品。

在这样的情况下，艺术世界与时装工业一样，需要季节性的炒作，让某种东西更受欢迎。从这种活动中所获得的知识是很成问题的，市场需求常常比艺术创新更能吸引人。

艺术的作用仅仅是适应市场流行的思路，我建议将艺术研究作为一个认识论的工具，一个探寻内在、知识和认知的路途，作为一个认识世界的工具，一个反应艺术应有作用的舞台，如同一幅可以让我们欣赏的美术作品。

## 研究的类型

现在我想来讨论一下对三类进程的研究：

### 反叛式研究、文化界和研究机构内的研究

但对这种分类不应作固定的理解，这只是我作为一个艺术家（同时也是研究人员）在研究中能够所作出的分类。

### 反叛式研究

从我70年代后期做学生时开始，我就看到研究领域一种现象或方式，即反叛式研究。



这种研究战略用于朋克运动，或更普遍化的、人们仍尚未定义或不能接近的东西。

从孩提时代开始，父母、学校和媒体一直在告诉我们如何看待事物，如何表述和解释世界。就是说，年轻人常常有这样一种印象，即对已经创造出来的世界，人们不可能有一种主观的、个人的解释。没有进一步的空间，一切都已形成而且有定义。

我们可以理解，每一个年轻的一代都试图在绝望中重新自创。可是怎么会这样呢？有时，这种无能为力的感觉也是一个手段：你不能改变，不过试试吧！

人们怎么能把一个弱项转变为强项呢？反叛式战略就是要寻找否定现有定义、挑战和嘲弄定义权威的可能。

—如何理解、挑战和跨越限度？

—没有必要知道你想要什么，知道你不想要什么是必要的。无知可以成为一个战略：我知道我什么都不知道！

—分配生产方式！在70年代后期，在艺术界美术是最有文化内涵的学科，很容易被劫持。可以用美术来反对美术。美术作品可以一钱不值，如果对艺术有足够的的不尊，美术作品便可极快地创作出来。

—规范可以被用来反规范：丑就是美！

所有这些战略都是自我授权，自我教育和身份构建的过程。对旧秩序的不信任使原先无权者改变了地位。

这些过程可以被看作是实验性的研究。出于显见的原因，我称其为“反叛性研究”。一些特别的情况在童年时便可见到，比如，一个蹒跚学步的小孩爬在厨房的地上，把锅碗瓢盆从厨柜里拉出来，乒里乓琅撒了一地，孩子的母亲把东西放回原地，五分钟后又散落一地，一次又一次地重复，直到母亲精疲力尽，呵斥孩子住手。

这种早期的实验性研究违反现有规则，探试着权力系统的极限，尽管有极大的困难仍然对世界进行着试探。

这是德国艺术界非常青睐的研究模式。大多数艺术家一辈子采用这种方式。它给人的印象是，他们是有天赋的半吊子、有反叛性、反权威、喜欢标新立异，而且特别主观，特别个人主义，在某种程度上很天真。

因为这个原因，反叛性研究不能真正被称为严格意义上的研究，因为没有反馈，很少有评价，对研究者来说是无意识的，没有对其作用的反馈。

## 文化界的研究

佛里森沃120是90年代初期我在科隆进行的一个项目，与我合作的有艺术家约瑟夫·施陶尔、尼尔斯·诺尔曼、基鸿·考斯拉和梅林·卡彭特。

从一开始我们就觉得有两种方式特别不具吸引力：成为画廊作家，或成为生产商的画廊。后者是一种由艺术家经营和资助的画廊，用以展示他们自己或朋友的作品。在我们看来，这种态度具有较少的自组性，但是表达了一种通过自助参与商业化艺术圈子的愿望。

如果采取其他方式，我们会拒绝采纳标准的判断参数和审议他们如何定义艺术作品、商品和对他们作品的接受程度。因为是处在一种半公开的情况下，项目需要试探它可能得到的空间，创造和鼓励交换和参与试探的机会。

空间成为一个聚会点，就是说围绕这个空间形成了一个圈子，活动在增加，只要这个圈子能保持下去。这种互构可以被理解为自行组织和教育、形成及发展的过程。

这个空间同时也有资料库的作用，记录了活动的情况，也可引发一些活动。

我们还发现，另外一些人以一种类似的自组方式进行活动，如维也纳、汉堡和柏林的爱好者协会，艺术家们建立电子网络，称为“东西”。

为了与福尔/许特佩尔兹保持一致，我称这类活动为“文化界的研究”。

—因为它们都是在艺术家圈子里。

—参与的人相互有一种吸引力，他们有着相似的问题，但是又有着各种不同的知识和文化背景。所以他们相互的吸引可以带来越来越不同的声音，参与者必须有足够的不同又有足够的相似性。

—这可以产生很有成效的集体工作，我称之为“研究”。

—这种工作自设任务，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个小的机制本身的力量。

—通常是就正在面临的问题进行调查，问题来源于日常生活中。这是以经历生活来对它进行研究。

几乎每一个20世纪的前卫小组（超现实主义、情景主义、1号公社，等等）都实践过这种集体方式。

在这种研究中，有进行自我观察和分析的批判性方式（如存档、记录和日记），对研究战略和实验方法作出计划。有的过程和评估标准可能导致更多的实验。从这里人们意识到有必要进行研究。

对文化界研究的了解是我获取信息最多的阶段，它成了我的大学，我接受艺术教育的地方！我觉得，自发组织主要是一种自行组织和自我



教育的活动，它提供了一种“创造大学”的可能。它让我进一步了解学术机构及其历史：

### 研究机构内的研究，及其他

有关研究机构和大学的发展，我们必须区别不同的知识产出和教育方式。

### 大学的发展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 在学术阶段，主要是使基督教教义合法化并对其加以解释。
- 在按洪堡模式设立的大学，研究意味着自我实现的过程。在这里，研究、教学和学习应该结合在一起。通过非等级分化而是相互交流形式召开研讨会所进行的小组工作特别重要。
- 如今，由于引入了波伦亚进程，这种模式经历了一个特别大的变化。对于我们正在经历的这个阶段，对其定义尚在进行。
  - 我们能不能说大学是一个开放的体制，邀请人们到大学来就知识的生产创建某种社区？
  - 或者说，这是一个较为封闭的体制，人们从此有限地进入教育和研究，并因此获益？
  - 或者说大学正在成为提供服务的地方：在一个知识企业内获得有效的工作培训？

### 从一开始学术机构就引发了不同的学习方式

- 学术机构在历史意义上只是一个小森林，是柏拉图和他的学生们闲庭信步和高谈阔论的地方。
- 在文艺复兴期间柏拉图思想复苏的时期，这种欢乐式的教学和学习又重新恢复了。学术机构在第二阶段变成了“业余爱好者和半吊子们集结的社区”。人们可以想象，开会就是松散的非正式集结，时间有限、空间不足。他们试图消除旧式僵化的行会体系。当他们最终成功了以后，他们创建了教育机构，也就是“业余爱好者和半吊子们集结的社区”，以培养他们自己的年轻人才，按柏拉图的说法他们被称为“学术人员”。
- 仅仅在一百年之后，绝对专制的国王向已经机制化了的学术机构发布了有关教学课程和学分制的规定和规则。

可能会出现熟悉的画面：最为专制的学术机构在波伦亚进程中看到了技术专家借尸还魂。那时和现在没有太大的不同，专制的学术机构向宫廷提供应季风格的产品，并从审美角度提供生产设计的技术秘密，以使产品在国外市场具有吸引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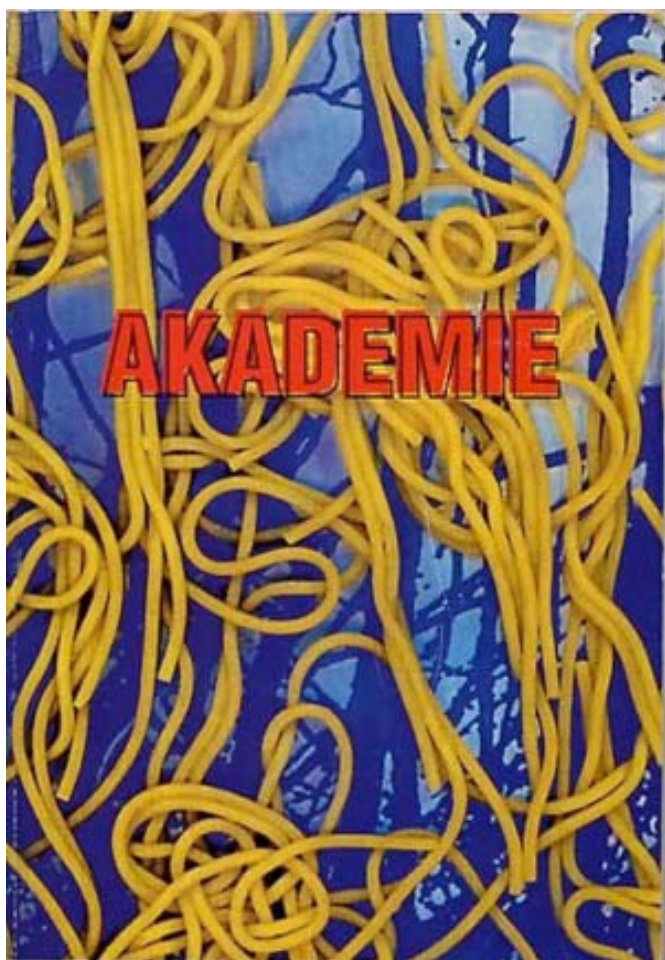
- 对于这种技术专家式和实用型的教育，浪漫主义时期的艺术家回到了中世纪手工作坊的方式，也



就是师傅控制对学徒的教育。而浪漫主义时期极富想象力的天才们不能自己成为一个天才，这也就是为什么，直至今日学术研究机构不知道怎么进行教学或如何进行研究。在这里学习就是模仿天才们——师傅们的风格，因此这纯粹是一个“浪漫主义时期”再生产的场所。

### 与此相反，我认为学术机构：

一是短期的、临时性的，自行组织的交流场所。



—学术机构不是一个机制，而是一种活动：活动内容是创建机制！

如果可以做到的话，它是一种无等级层次、由想法类似的人进行的交流形式，是一个促进自我价值实现的过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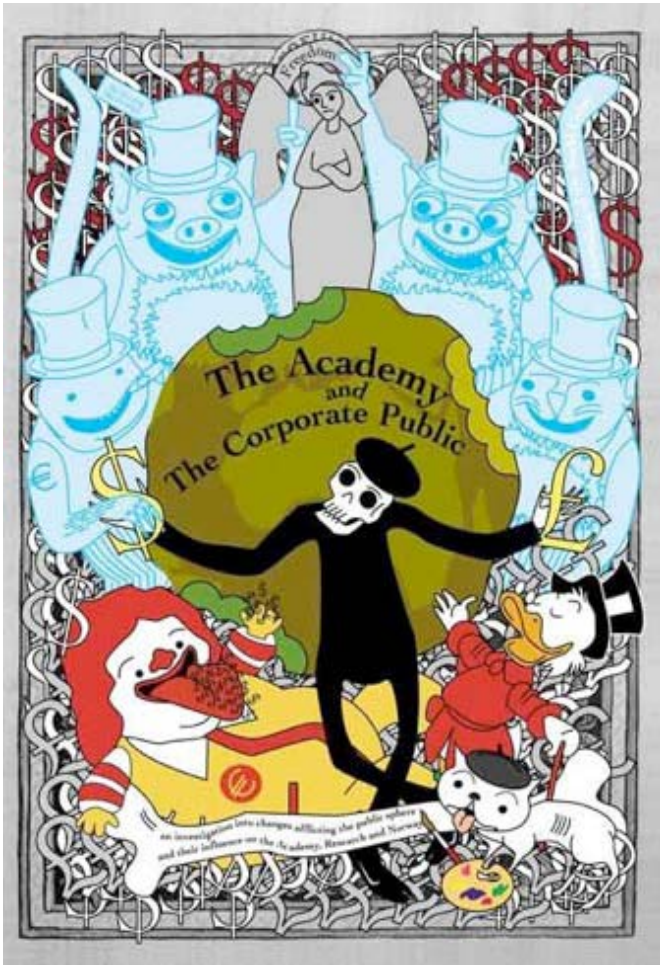
### 艺术领域的机构内研究

我曾根据特别机构学术研究的想法编辑了一本书，并像一个一无所有的预言家一样推销这本书，编辑这本书后，我成了挪威伯根大学的教授。我总在想，如果人人可以“创建学术”，这些学术机构会出现什么情况？机制又有有什么用？

同时，伯根艺术学院获得了大量的政府资助，鼓励老师开展研究项目。哈琳娜·杜森·沃塞特作我的研究顾问，她的任务是向我解释在大学里研究应如何进行：

—但是这个调查的过程不是研究，这仅仅是必要的第一步，“调查”。这个调查仅能将已有的知识收集起来，而研究是探究一个尚不存在的东西（很有意思！因为那时许多艺术家正在进行这类探索，常常仅展示他们探寻的东西，这显然不能被称作研究！）

—研究的下一步是找到看待这个问题的特别的视角，一个关于从哪儿和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的特别的观点。这被称为“问题的现状”



或者“需要提出问题的方面”（啊哈，问题的决定取决于调查的情况）。

—接着，使用的方法源于研究者在该领域的经验（很明显，一个艺术家要使用艺术的方式！）

—跨学科的方式不是更好的方式，只有在本学科变得过于狭窄的情况下跨学科方式才有意义。（在这种情况下，必须首先有不同学科和相关的专业知识。）

—研究最重要的因素是实验！通过实验必须了解是否已有解决问题的程序、问题的性质可能会发生

什么变化。可能90%的实验会失败，不用担心！这是不可避免的，否则这个过程就不叫实验了（这让我高兴！）

—对研究过程的反映和对实验的评估对研究项目的进展极为重要。只有这时才能发起下一个实验。可能会有一系列实验和评估，让研究者开始一个未知的旅行（但是谁来评估实验的进展？）

—当然，首先是所有的研究者、他们的团队，然后是由同行组成的专家小组，然后是机构和机制化的批评者。评估机制、批评家和公众评论要围绕同一中心增长。

—展览会、演示、批评评论、小册子、书籍、网页和广告可以被看作实验的一部分，他们可能会帮助扩大研究的公众效应。

听了对机构行研究的大学研究概念的介绍，我很吃惊地承认，这一切均适用于一般性的艺术起源，也适用于我自己的艺术实践。

## 第二部分 学术机构与企业化社会

我在伯根开始的研究项目就是要探寻公众领域如何通过全球化、私有化和企业化发生变化，这对艺术领域又有什么影响。

直至今日，公众领域的理念是一个破碎的理念，理想地说，它应该是一个进行公众辩论的地方。现在我们根据次文化圈、次种族圈、性别和阶层分解来讨论不同的公众领域。它们可以相互交叉、混合或相互冲突。

但是这个圈子有什么共性？在我看来，它们都是市场或被瞄准的市场。

我称这种支配性的公众领域为“商业化大众”，它依赖于商业经济（并与其发生冲突？）市场是不是这些公众领域唯一共同的地方？这对艺术意味着什么？



## 当代反乌托邦：赞助、品牌、企业社会责任

公众领域如何变成了一个企业？企业社会的起源是什么？我就是——一个见证！

### 80年代我们有赞助：

在这时，企业是艺术赞助人，其作用仍然相对被动，就像无私的“保护者”。研究表明，赞助制度比传统的广告形式更有效，因为它可以直接与一个目标小组联系。

随着公司标识（和自我意识）的增强，国家和市政艺术资助经费缩减。公共部门赞助人自然很乐意减少自己的责任和决定权，将其转移给私营公司。由于国家资助的减少，对于公司赞助的依赖性增加。这就带来了问题！

由于赞助商的承诺仅仅取决于名声的考虑或经济利益计算，是否赞助某一项目出于予片面的考虑，而且是比较武断的。一般情况下没有民主的合法化过程，没有长期的资金保障。因为所有一切都取决于赞助商的意愿，资金来源常常很不确定，这使得赞助商可以对被赞助项目施加更大的控制和影响。

### 下一步，在90年代出现了品牌：

许多公司不是通过赞助支持先驱艺术，而是自己变成先驱！次文化小组常常用艺术方法和解放思想的战

略服务于市场战略。这些公司对艺术家的支持和研究时间很长，所以它们可以自己表现得像艺术家一样，从最为廉价的商品上，通过艺术的定义创造价值。品牌的功能像一个签字，它使得商品变得尊贵。

### 我们开始谈论企业社会责任…

当私营公司卷入社会机制，开始为公共机构承担责任时。大约在新世纪开始之时，私营公司开始发挥“好心人”的作用，在社会福利领域充当保障者：麦当劳开办一家儿童医院、壳牌石油公司扮演拯救环境的角色，柏林大学图书馆重新命名为大众图书馆，西门子关注艺术学院的未来……一幅亲情充盈的画面！

但是我们怎么解释我们面临的完全瘫痪状态，即我们继续目睹发生在我们面前的企业接手的情况？

### 企业教育

当企业着手接过培养、教育和培训时，

- 他们此举不仅仅是将大学作为他们产品的新市场
- 他们此举不仅仅是为了从大学的教育过程中直接获益
- 他们最终的目标是利用大学的教学和机构来向新一代灌输“新资本主义精神”

### 教育作为服务行业：

—忘掉教育！大学成为纯粹的书本知识的服务提供者。洪堡意义上的教学和研究的联系已经解体。

教学成为一种服务，研究外包给了企业。

—学生变成所谓的人力资源，这种资本的生产已经带来收益。作为服务的享用者，使用者需要付费。

—他们成为一种资产，通过企业教育进行塑造和产品化。这些资产需要学会具有灵活性和应招性，要学会活化、夸赞和销售他们所学的社会知识和书本知识。

—他们还必须学会把握生存的必要条件，找到具备这一条件的机构。

### 建立新的结构

大学不是一个让学生自我建构、争论和批评性分析的场所，而是产生新意识形态的工具。这个宣传市场整体性的过程本身已经是一个有利可图的市场。

### 现有的机构据此相应设立：

—学士学位是未来在就业中“成功者”的一个基本资格。由于入学要求比较低，收录人数较多，因此相对来说比较能承受得起。

—硕士学位给那些“适合于”某种职业的人，但是由于收取率有限，只有能承受得起的人才能就读。大约40%之60%的本科生能够升至研究生。毫不奇怪这里就是实际可获利的空间。

—终身学习是一个很火的新市场。知识需要不断地更新，在就业竞争市场，人们需要证实这种更新的文凭。就是说，一个人注定要在职业生涯中终身被锁在知识的提供上。更新知识可能会花费很大，但这种服务的消费者常常有工作，所以消费得起。



我们看到知识提供的全部概念是需要付费。从摇篮到坟墓，一个人必须加强他的资本价值，建立这一资本、保持它永远鲜活，让它市场化并使其具有新的活力。

## 大学成为企业

以前的“知识工厂”（1970年代的表述）在新经济情况下已经改变了。大学正在变成企业，在全球各地以自己的方式运转着。他们在世界各地敲击着新市场的大门，建立着网络和附属机构，维护着他们的知识品牌。

这就是为什么他们与商业咨询紧密交织（如，麦肯锡公司、罗兰·伯杰战略咨询公司和安永会计师事务所），并且进行通常的结构调整：工程管理的改造、设置经营特许、创造品牌、与其他企业合并、外包……

问题：大学企业与谁联合进行研究？谁拥有研究所产生的专利？谁有权传播新获得的知识？谁有权使用？

## 一个新的集权主义正在产生

如我们所看到的，新自由主义经济的逻辑成为大学的主导原则，如同在所有其他行业一样。在过去几年里，在社会的各领域也发生了同样的情况。在民主选举的各国政府及其法律制度之上，超国家的企业订立的协议，设立了国际组织（世界贸易组织、关税和贸易总协定以及新

近成立的服务贸易总协定),使它们可以占领所有的市场和公共服务领域。

这种趋势甚至发展到十大多数基础行业被私有化(航空、供水、能源、住房、新闻、卫生、医院、疗养院)。如果我们假设仍然生活在民主方式组织的社会,那么私有化就等于没收了社会财富。

几年前,企业接受传统上是国家特权的一些功能看上去好像是创造形象和品牌:国家权力变成了企业权力!但是企业同时更深地进入了社会生活,这是国家从未能达到的:现在企业已经成了构成社会生活的一个因素!

我们不断地消费着企业!我们使用、饮用、爱戴着企业,我们看到、触摸着、感受着企业……

跨国企业不仅已经拥有了所有的秘方、专利和知识产权,再生产也就是教育机构的接手,意味着这个“资本主义新精神”将影响未来几代。如同改变基因密码,一个新的意识形态正在自创之中。结构也在做相应的程序改变,逆转看来是不可能的。

我已经感觉到自己生活在新的专治之下,这听起来有点像偏执狂。我知道我什么也不知道。

## 知识社会—公开的来源,公开的途径

知识是一种独特的资源。安德烈·格尔茨写道:

- 知识不是一种一般商品。
- 知识在与他人分享时将奇迹般地增值。
- 一个人使用的知识越多,他创造的知识就越多。
- 知识的传播增加它的有效性。
- 知识不能用金钱来衡量。
- 知识的私有化减少知识的含量,有违于它的精髓。

正是在资源变得短缺的时候,知识资源在恰好的时候奇迹般地出现。知识在被使用时增值!知识的提供从来没有终结!它的价值是无法衡量的!一个专利能不能是 $1+1=2$ 或者爱因斯坦方程的价值?

如果根据资本的逻辑,用知识创造利润,接受知识的途径就应该是有限制的。人们会为获取最基本的知识付费,附加的知识需要增加付费,因为它可以使人们增加资历!研究需要在封闭的小圈子里进行,专业知识必须用专利、知识产权等来保护……

人们称知识是21世纪的石油，我们正在目睹知识分配和私有化的战斗。抢占大学阵地、专利甚至人力，将知识产权扩展到知识生产的所有领域，都是为了从紧缺的资源获取利润的私有化战略。

这与所有通讯渠道的监视同步发展，在这个方面知识也在被创造和分享：英特网、电视、电话、印刷媒体和公共场所的运用。

## 结论

最后，在艺术家和研究人员、学生和教师之间，你站在哪一边呢？

我们是不是新型的宫廷艺术家？我们伴随着资本在全球成功地行进，我们是不是因此成为资本统治的同谋者？

我认为，研究从来就不是中立的，也不完全是自己的事。研究需要应对世界上的各种矛盾。研究可能会通过内部的发现、通过试验和斗争改变世界！

正因为如此，研究机构内进行研究是必要的，但是这种研究深受机构逻辑的限制。因此我需要让文化界拿起武器来！

文化界的研究为不受限制地创造知识发挥着主要的作用，这是一个新的现象。

## 文化界的研究是自发组织的（我在此重申）：

—它发起于现有的条件，是自我驱动的。

—它自我投资解决最急迫的问题。

—它是批评性思维的具体化，是政治分歧和社会控制之外进行分析的最后场所。当矛盾越来越激化时，我们要继续在父权制和新自由主义的废墟上生活。摆脱这种束缚需要锲而不舍。

—我们怎么能建立坚实的基础，在此之上与他人一起创造可持续的知识并使其面向所有人？

—如何将这个知识与精英和专家自称的“知识社会”相区别？而他们是脱离那些成千上万仍然做着肮脏工作的人创造了属于他们自己的知识。

—我们所需要的是可以导致根本性社会变化的研究。

—象征性的表示非常重要，必须利用社会上人们对艺术和科学的关注！但是这还不够！

—研究必须走出安全的机构，走上街头。研究必须带有立场，必须保护最重要的资源—知识不被私有化：没有专利，没有知识产权，没有获取的限制！

我们要为反对私有化的增加而战，要创造共性，学会如何分享，因为知识必须面向所有人才能增长。

我们要做的是很多，研究从来没有像现在那样具有必要性！

路途可能很遥远，但这是一个全新的事情，它需要我们付出很多努力，但也会其乐无穷！

\*\*\*\*\*

**让我们启程吧，  
现在就动身！**

\*\*\*\*\*

2010年Stephan Dillemath

